

新 / 闻 / 传 / 播 / 学 / 丛 / 书

■ 主 编 ■ 李 珮 ■

戈公振 新闻思想研究

蔡 斐/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 / 闻 / 传 / 播 / 学 / 丛 / 书

■ 主 编 ■ 李 珮 ■

戈公振 新闻思想研究

蔡 斐/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蔡斐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10
(新闻传播学丛书 / 李珮主编)
ISBN 978-7-5657-2107-6

I. ①戈… II. ①蔡… III. ①戈公振 (1890—1935) —新闻思想—研究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077 号

新闻传播学丛书

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

GEGONGZHEN XINWEN SIXIANG YANJIU

著 者 蔡 斐
策划编辑 姜颖旎 司马兰
责任编辑 姜颖旎 司马兰
特约编辑 魏 征
排 版 楠竹文化
装帧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4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245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107-6/G·2107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李希光 欧阳宏生

编 委：李希光 欧阳宏生 李 珮 罗小萍

李 韧 蒙晓阳 贺 艳 王 炬

陈笑春 裴永刚 屈永刚 赵文丹

主 编：李 珮

副主编：李 韧 罗小萍

总序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是重庆市第一所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建设的新闻学院，筹建于1994年，199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学院在办学之初提出了“主新辅法”的培养模式，形成新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并整合了法学、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资源，形成“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三者并重的办学特色。

学院2010年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学院保持发展法制新闻特色办学15年之后的一次理性拓展，力求充分整合国际国内优势资源，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与传播人才。

2015年是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为总结我院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提升学术影响力，从2014年起，我院陆续向社会呈献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

第一套丛书共11部作品，已经于2014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11部作品分别为：《新闻侵害人格权研究》（蒙晓阳著）、《中国电视娱乐文化批评》（李林容著）、《法律的电视虚构生产——中国当代法律题材电视剧研究》（陈笑春著）、《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蔡斐著）、《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竞争策略研究》（裴永刚著）、《媒体是信任危机的帮凶吗？》（郭晓科著）、《关于“家”的想象与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文化研究》（贺艳著）、《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史》（郑微波著）、《重庆都市报发展史》（赵文丹著）、《关注热点：特定议题新闻报道研究》（陈丽丹著）、《地理影响与文化表征——重庆电视纪录片研究》（周松著）。

这11部作品分别代表了我院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四个研究方向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我院新生代学术实力的一次整体亮相。

即将面世的这套丛书共15本，是我院面向社会推出的第二套丛书。该套丛书的作者主要以我院的青年博士为主，也是我院青年教师在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四个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李珮等人的《网络环境下突发事件传播与管理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网络环境下突发事件案例的剖解、反思，以及引入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勾勒突发事件在网络环境下的“异化”以及不同诉求传播主体间的博弈、妥协与共谋。根据网络环境下突发性事件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网络舆情事件”的概念，并据此指出相应管理制度的缺失和法制建设的盲区。在此基础上，深度思辨突发事件政府应急管理陷入的误区，并尝试在“中国特色”框架之下给出网络环境下加强突发事件管理的对策建议。

陈笑春的《影视作品里的中国法治进程》，主要以法治题材的电影电视作品探讨了虚

构的影视作品对于现实法治进程的再现及其社会语境。该书以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发展的滥觞、发轫、兴起、多元和转型这五个时期为分野，每一个部分中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影视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影视作品对个体生活的再现，令法治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在微观故事中变得具体而多样，诠释了法治内涵的现实性和丰富性。

贺艳的《媒介表征与城市形象：以重庆为例》以重庆为研究个案，从较为宽泛的媒介界定出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在文学作品、报纸、电视、电影、网络等多种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之中，重庆呈现为怎样的形象？重庆的这些形象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媒介所呈现的重庆形象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蔡斐的《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以中国新闻传播史奠基人戈公振先生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的眼光和翔实的史料剖析了戈公振新闻本位、新闻法制、新闻教育、自由主义、新闻编辑、媒体经管等新闻思想的各个维度，全面展示了戈公振新闻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征。

谷李的 *Intellectual Constellations* (1980—2008)，提出文学、电影文本和文化经济政策及其讨论、批评作为知识分子聚集并集中表达和建构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场域。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个案分析，该书勾勒出一一种可称之为后社会主义情感结构的现象的一些侧面。

杨婷的 *Effects of SNS Use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cialization: Focusing on Chinese Students In Korea*，研究了在韩中国留学生的社会化状况。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定量研究阶段，通过自填式问卷调查，对社会化结果（包括学习动机、社会融入程度等六个变量）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各个变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在第二个阶段，运用深层访问法，分三个阶段（期盼阶段、遭遇阶段、习得与改变阶段）对被访者的社会化状况进行了分析。

刘娟的《疫病防治与健康传播：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1891—1952）》，在挖掘大量民国时期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从阶级基础、社会组织、文化建构及行为模式等方面，以19世纪以来天花防治为背景，截取重庆开埠直至宣告天花灭绝为时间切片（1891—1952），描述牛痘接种的信息从传播到扩散，最终改变民众防疫行为的过程。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以历史的视角拓展了“创新扩散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运用，认为阶级基础是重庆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扑灭以天花为代表的烈性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以期为当下疫病防控提供本土经验。

屈永刚的《儒家政治正当性观念发展研究——从孔子到董仲舒》，以西汉初期之前儒家政治正当性观念为研究对象，以孔、孟、荀正当性观念为基点，上溯殷周时期，下及西汉初期（以董仲舒为代表），对西汉初期以前儒家政治正当性观念的渊源和发展作出了系统的梳理。

刘大明的《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研究》，主要介绍了宋代在新闻传播、政治文化等诸领域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重点阐述了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宋代出版传播活动和宋代文人谈兵论战及其兵学文化繁荣等系列议题。

申可君博士所著的《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居民参与要素的新特点，构建一套有效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六个二级参与机制，并剖析该机制的形成、分类及其影响因素。同时，提出推动居民参与机制运行的保障条件，以期能助力基层政府摆脱长久以来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

廖宇翔的《大众传媒对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研究》从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相结合的新角度研究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知识和信息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分布是城乡差异的基本原因,提出了缩小城乡差异的新途径是改变知识和信息在城乡之间的供需失衡状态。

刘必华的《转型社会中的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要求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取向的传媒体系。该书从体制、话语与实践三个层面考察了中国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表现,并从传媒治理、职业道德和受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任正安的《走出现代的尴尬——边缘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的土家族样本》观察了在新传播环境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沟通与媒介使用现状与变迁,将文化传播和媒介教育相结合,以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为出发点,探讨如何更好地在少数民族集中的西南地区提升媒介教育,进而提高其媒介素养,传播本民族文化,以对传受双方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元互动的高度重视探索传播效果的有效提升。

徐金的《解码与编码——广告创意实务》旨在运用符号学和结构学视角对经典广告进行分解,寻找出独特可行的广告创作思路,总结出广告思维及创作规律,并通过广告创作实例展示广告创意及创作方法的运用。

这套丛书集中体现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的传承和创新,也是我院新生代学术实力的再一次整体亮相。

甲戌年间建经纬,荏苒岁月二十载。

日钟两江之灵秀,月沐法府之鸿光。

法治新闻创特色,全球视野开新章。

心系天下得清誉,五湖九州望徜徉。

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学术界对我院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是为序。

李珮

2015年12月于毓秀园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二章 试论戈公振新闻观的基本观点 ——兼谈学界对戈公振与陆定一观点分歧的学术批判	012
第三章 戈公振新闻史学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023
第四章 戈公振新闻实务思想探析	035
第五章 戈公振媒体经管思想研究	049
第六章 戈公振新闻法制思想论略	056
第七章 戈公振新闻教育思想研究	061
第八章 戈公振新闻时评论略	067
第九章 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剖析	073
第十章 五四时期新闻本位思想探析 ——以戈公振为中心的考察	081
第十一章 世界的眼光 中国的问题 ——重读戈公振先生《新闻学》	090
附 录 戈公振文存	098
参考文献	140
后 记	145

大凡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往往都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数。不过时间有其自然规则，时过境迁之后，过去难以言说的种种很容易被重新审视与评价；同时，随着时间流逝孕育而成的冷静与沉思，呈现出更多元的观照，为后人端详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戈公振，是活跃于近代中国新闻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新闻大家。长久以来，或许因为对《中国报学史》敬慕的缘故，他一直被推崇为中国新闻史学的奠基宗师，但鲜有人愿意正视戈公振先生完整的新闻思想，戈公振的新闻思想也因此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未能全面地呈现在研究者的视线中。悲观一点说，如若再不加以爬罗剔抉、归纳反思，戈公振的新闻思想甚至可能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随着史学观念的推陈出新和研究方法日益趋于多元，时代正给予我们一个解构戈公振新闻思想，并且研读其在中国新闻学继受和变迁过程中究竟占何地位的契机，这也是后代学人不可推卸的学术义务。

一、研究动机：弥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罅漏

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新闻史的著作，如同翻开一部简编的历史花名册，它把已经逝去的新闻名人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并按照时代的要求和作者的好恶，一个个论功行赏。这种简单的笔调，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历史顺序，方便读者归纳和记忆。

于是，在各类著作中，戈公振通常会被描述为如下形象：戈公振（1890—1935），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江苏东台人。我国近代著名新闻学家。1913年进入上海有正书局工作，初任校对、助编，后升任编辑直至总编。之后，戈公振在上海《时报》工作了15年，也曾在上海《申报》短暂工作。自1925年起，他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报学系任教。戈公振于1927年和1933年两度出国考察国外新闻事业，足迹遍及英、法、德、意、日、苏联等国，1935年10月在沪病逝。戈公振的专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从东北到庶联》，译著有《新闻学撮要》，并编辑出版有《中国图案集》。其中，《中国报学史》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代表着近代中国报刊史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自1927

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

透过厚重的历史，以上几百字的简介只能算是最粗浅地勾勒出了戈公振的历史背影，我们要穿越百年时空，在故纸堆中探寻人物的历史原貌，特别是要发掘戈公振的新闻思想及其在中国新闻学历史脉络上的意义，就不得不对戈公振进行一番从头到脚的“全身扫描”。

1913年冬，23岁的戈公振只身前往上海，进入狄楚青所创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翌年，被调至《时报》馆工作。从此，学徒工出身的戈公振正式迈入上海新闻界，开始了他的报界生涯。

戈公振在《时报》馆前后工作达15年之久。从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到被提拔为总编辑，并代理狄楚青主持报馆事务。在《时报》馆，他对《时报》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创办了许多副刊，其中最突出的是1920年6月9日首创的《图画时报》，开我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之先河。他编译的《新闻学撮要》和专著《中国报学史》，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间，他还积极从事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研究。他发起组织和主持的“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和“上海报学社”在当时的新闻界影响很大。同时，他先后在上海南方、国民、大夏、复旦等大学院校讲授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学早期的骨干教师，为新闻界培养了不少人才。这段时间，是戈公振成长的关键时期。新闻实务界从基层到顶层的全面锻炼，给了他综合了解中国报业体系框架的机会，让他在新闻实务的各个岗位，如采访、写作、评论、编辑、管理等，都有丰富的所得。同时，当时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三家中国顶尖报纸的激烈竞争，使戈公振有了全局性的眼光，产生了对中国报业整体性的兴趣与担忧。他的思考，不再局限在一报一版，而是“中国性”的，这种思考，也延伸到了他对中国报业过去与未来的发散性探索中。于是，借助中国早期新闻学的从教机会，戈公振不辞辛苦，编写出《中国报学史》，书中既有史料梳理，又有学理总结，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学历史上标杆式的人物。

1927年1月29日，戈公振辞去《时报》馆的工作，自费出国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世界新闻事业考察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考察。这次考察，他的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美、日等国。他还受国际联盟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和其他一些国际性会议。国际考察开阔了戈公振的视野，也进一步使他产生了变革中国新闻事业的种种想法。仔细研读戈公振的论述，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世界的眼光、中国的问题”，他能够从世界新闻学发展的高度和前沿，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新闻事业该怎么做，这是民国期间罕有的全球眼光。并且，这种世界与中国结合的思想不是务虚的，是和中国新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的。

1928年底，戈公振回国后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聘，次年到《申报》工作，并在《申报》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前后，他将自己出国考察带回的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应用到了《申报》的改革中：1929年5月，创办了“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1930年5月，创办了《申报图画周刊》。另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他经常与杜重远、胡愈之、邹韬奋等人聚会，讨论抗日救国和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募捐集资，办报撰文，座谈演讲，热情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正义斗争。可以说，爱国主义一直是流淌在戈公振先生血液中的重要因子。他的新闻思想，不只是一种纯粹学科式的总结与反思，而是时时刻刻充满着爱国主义，充满着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忧虑和激情。

1932年4月18日，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上海。戈公振以记者身份参加中国代表

团，随同李顿调查团赴上海闸北战区、东北北大营等地调查日军侵华真相。同年9月又随团前往日内瓦，参加国联讨论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至此，他离开了《申报》。

1933年3月1日，中苏恢复邦交，戈公振随复交使团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出国考察。他在苏联前后近三年，行程四万多公里，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等城市，以及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和中亚细亚等地，撰写了不少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通讯报道，向中国人民展示了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的巨大成就。他还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和梅兰芳剧团赴苏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做了大量工作。邹韬奋先生收集整理出版的《从东北到苏联》一书，详细介绍了戈公振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这段时间，是戈公振个人思想的猛烈进步时期，其思想显示出向社会主义思想转变的种种特征。

1935年秋，戈公振应邹韬奋、胡愈之电邀回国，准备重新创办《生活日报》。不幸的是，抵沪一周后，他便于10月22日突然病逝，留下了“我是中国人”的不朽名句。

“戈公振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这是戈公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时，当代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对戈公振的评价。他认为：“（戈公振）在新闻的编辑采访、通讯评论写作、报业经营管理以及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等方面，都作出过十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工作者、新闻学者的一生。”^①“像戈公振这样在新闻战线的各个领域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多面手和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也许只有邵飘萍稍稍能与之比肩，此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②

的确，戈公振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是一位有着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报业经营管理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他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举世瞩目的新闻巨擘，这在旧中国的报人生涯中是少见的。他所走过的路，是引人注目的。

他首创的《图画时报》，使我国报纸的画刊从“石印时代”迈入“铜版时代”，掀开了中国画报史上新的一页。

他是我国第一批到大学讲台公开讲授新闻学的拓荒者，是我国早期杰出的新闻教育启蒙者，也是国际上较早提出国民媒介教育的倡导者。

他撰写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中国报刊发展史的专著，是近代中国新闻学著作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

他是第一个确立将“报刊史”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新闻专家。他为新闻学的分支学科——报刊史划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为报刊史乃至整个新闻史的研究打开了思路，拓宽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

他是以中国新闻学者身份在国际讲坛上演讲的第一人，他在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轰动全场。

他亲手创建的“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以及一整套《申报》剪报室的资料积累和科学管理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也是近代中国所有报馆中唯一完备的资料及管理制度。

他发起组织和主持的“上海报学社”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久的新闻学术团体组织，在当时的新闻界、学术界及至文化界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①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戈公振纪念文集》，《江苏文史资料》1991年，第2页。

^②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盐城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东台市人民政府：《戈公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991，第123页。

他是我国新闻界对西方新闻事业做过全面考察的第一人。在戈公振的两次出国考察中,他最大的特点是:看外国,想中国。在旅途中,每至一处,戈公振都留心观察,只要对中国有利的东西,无一不产生浓厚的兴趣。上至英、美等国大报馆的先进设施,下至德国的街头卖报亭、日本的街头新闻图片和展览橱窗,戈公振大多主张引进国内,用来发展我国新闻事业。

他是近代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文、德文、英文著作)的第一人,加上他在上海《时报》和《申报》的工作实践经验,戈公振特别擅长以西方成熟的新闻理论来研究中国报业的现实问题,并在比较中展开研究,在报纸与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中进行分析。因此,他那时闪现于论说中的大量创见,成为中西新闻思想交流和新闻观念演进的“桥梁”。

这些琳琅满目的专业主义标签,加上戈公振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新闻思想与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相互交融,呈现出五四时期新闻界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世界。因此,这些闪光点都不应该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中缺席,都不应当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遗漏,这也是诱发本书研究的最主要动机。

二、研究方法:复杂地看待戈公振新闻思想

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话题。王蒙先生在《我的处世哲学》中的观点令人回味:“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和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确实,单纯研究戈公振个人也好,研究人物思想史也罢,远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进行此类课题研究,很容易停留于对戈公振新闻活动的论述进行罗列、介绍、诠释和说明,这样做并无不可,也是相对容易的。但其弊端是难以深入理解特殊时代背景之下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精髓,也无法体现课题研究应有的学理品格。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对人的新闻思想的化简和提纯,这项工作有着无可厚非的积极意义,但要如实且全面准确地认识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及其在时代舞台上的价值,本书更倾向于采取一种多重视角的综合维度对戈公振新闻思想进行考察。

(一) 历史与现实

对新闻思想的研究来说,许多学者的分析与研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分隔的。要么对新闻思想的考察纠缠于过往,缺乏对新闻思想现实的当然关照,缺乏对新闻活动现实的经验指导与教训;要么在对新闻思想的分析中,显现出一种对其发展历史置之不理的态度,更对可能从历史中得到的若干借鉴持一种轻蔑的、傲慢的、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对戈公振新闻思想的思考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同时进行,并体现出其前后传承、绵延相续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联系。

(二) 平面与立体

对新闻思想的梳理方法来说,不少学者总是愿意以一种先验式的固定分析框架(即以新闻活动及其运作为核心)来把握新闻思想。这种方法虽然可以直接并且便捷地提炼出结论,但基本上是一种平面把握,对新闻思想的“起、承、转、合”没有立体把握,不关注

新闻思想存在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对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合力作用发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研究不够。所以，对戈公振新闻思想的思考必须以一种立体的观点来审读，从彼此依赖、彼此制约的双重互控关系中梳理出戈公振新闻思想的来龙去脉。

（三）进化与建构

自然界的演化进路大抵有两种：一是瓜熟蒂落般的自然进化，一是剪枝嫁接般的人为建构。同样，各种中国新闻学思想的演化过程也体现出以上两种进路，特别是在戈公振所处的那个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的时代，在文化涵化的作用下，要清晰地辨别和厘清戈公振新闻思想中的外部引进与内部生成，或者那些杂糅着东西方结晶的观点，恐怕不是一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就能解答的事情。“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①戈公振作为五四时期新闻人群体的旗手，自然也不例外。

（四）理论与实践

理论的诞生，大部分要归功于学者的努力。他们之所以能够铺陈理论，也是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之处：俗一点说叫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雅一点说叫能从表面的、具体的、直接的感性认识飞跃到本质的、抽象的、间接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依靠的是主体的思维能力对感性材料的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但是，理论只是在逻辑上或者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可能情形，实践关注的则是真实的可操作性及其运转方式。因此，分析戈公振新闻思想，虽然不必苛求理论阐释与实践运作的统一，但必须要正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能想当然地将二者等同视之。同时，必须充分厘清戈公振新闻思想与戈公振新闻实践之间的关系，没有戈公振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恐怕他很难会有思想上的诸多建树。

（五）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空间是新闻思想生成和发展得以成为可能的两个结构性维度。就时间而言，戈公振的新闻活动主要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却先后经历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几个思潮迸发的阶段。就空间而言，戈公振的新闻足迹不仅遍及新闻事业刚起步的中华大地，更是遍及新闻事业早已成熟的西方诸国。进一步讲，如若将戈公振新闻思想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间，以及与世界新闻事业交互的传播历程中，那么在时间与空间上，要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透视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恐怕都要推倒重来。

（六）聚焦与背景

毫无疑问，要研究戈公振新闻思想，我们必然要把焦距定位在戈公振个人身上，不过背景的问题始终需要注意。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总是很少去想象和推测那些直接的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只是把那些遥远的、可能影响某些思想的政治大事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思想者的“大背景”，全然不顾人物与背景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于是，直接背景的虚化和间接背景的凸显，使人物思想被提升到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甚至蜕变成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这种脱节在本书的研究中必须坚决摒弃。

^① 陈力丹：《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新闻战线》1989年第6期。

（七）目的与工具

本书的写作目的，前文已经有所交代，即试图弥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缺漏。不过，犹如补锅匠补锅一样，要填补细小的砂眼，各式工具一个都不能少，只是打块补丁肯定是不行的。本书强调的是，新闻活动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动态的、互相联系的世界中。要关照新闻思想，必须从同时代，乃至所处时代前后的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诸多方面加以考察，用多种“工具”来达到“补锅”的目的。

（八）复杂与简单

如果说以上分析都是从外延的角度来说明考察戈公振新闻思想的复杂之处，其内涵的复杂之处更不能忽略。戈公振之所以能够在同时代的新闻人中引人注目，并能够载入新闻史的史册，充分说明他的新闻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有点、有线、有面，纵横交错，相映生辉。同时，也说明这种新闻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涉及戈公振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及其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句话，这种新闻思想是复杂的，简单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来看待戈公振新闻思想是不全面的，所以，对戈公振新闻思想进行化简与提纯并不妥当。换言之，这种做法也是本书的，抑或是治学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和不足。

历史与现实、平面与立体、进化与建构、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聚焦与背景、目的与工具、复杂与简单这八个视角，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且相互对立，既统一又斗争，而正是这一矛盾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动力。

三、文献回顾：从四大症候到学界新兴热点

戈公振先生虽然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理应且必须占得一席之地，但关于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相关论述及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以2006年为界，戈公振新闻思想大体呈现出两个特征。

根据前期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比较，2006年之前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相关论述研究呈现出“同、浅、旧、偏”的四大症候。仔细解读下来，这其中既有新闻史学治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也有在本书之中凸显的个别性问题。

1. 同——相同

有关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学者多习惯采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的表述。这类问题多出现在诸多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命名的教科书之中，譬如某书对戈公振的解释如下：戈公振（1890—1935），中国记者，新闻学家。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江苏东台人。1914年起进入上海《时报》工作，从校对、助理编辑到总编辑。戈公振对研究中国新闻史有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中国报学史》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出版后，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文版。

以上表述显然采用了一种拿来主义的手法。第一，于1992、1994、1996分别出版的第一、第二、第三卷《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来的丰富积累，开拓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篇章。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篇幅宏大、内容厚实、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第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主持人方汉奇先生作为如今新闻学界的前辈学人，与戈公振并称“中国新闻史

学上的两座高峰”，他在新闻史学上的贡献，学界至今无人能及。并且，方先生对戈公振先生尊敬有加，曾谦虚地说：“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做了一点后续的工作。一个学科需要有历史的传承，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①于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权威性加上方汉奇先生的肯定赞扬，由此两点，许多书籍便不由自主地直接或间接采用了出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表述。当然，还有一点，当今的新闻史学者的学术成果往往偏爱以皇皇巨著形式出现的宏大史学叙述，对于如同戈公振这样微观的历史人物则缺乏细致的考证。因此，对戈公振这样处于研究“细枝末节”上的人物的介绍来番引用也就情有可原，不足为奇。

2. 浅——肤浅

有关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停留在叙述其生平和对新闻史学研究的贡献两个维度。在一定层面上，“浅”的问题实际上是由“同”的毛病所引发的，正是因为如出一辙地采用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的表述，所以历史学通史研究的病灶也原模原样地植入到了对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之中。

一方面，《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采用的是“宏大叙述”的编撰体例，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两汉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一直延伸到当代新闻事业，前后共2,200余年。所以，不可能在戈公振这样一个仅仅在新闻界工作20多年的人物身上进行细致入微的全面考察。加之在传统新闻史学研究中，学者通常将历史事件当成研究的主要方面，忽略甚至漠视人作为事件的行为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对个人新闻思想的研究只是一笔带过，不费更多笔墨。另一方面，由于在戈公振的诸多作品中，尤以《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效应最大、最广、最久，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至戈公振才有新闻史”。很多人是因为知道《中国报学史》，才知道戈公振，而不是因为戈公振，才了解《中国报学史》。所以在关于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上，后人往往只是将视线对准《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必然也因此着力突出《中国报学史》的历史地位，戈公振其他的新闻思想则沦为“陪衬”和“龙套”。调侃一点说的话，戈公振是因为《中国报学史》才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却也是因《中国报学史》而遮住了其人及其思想的原貌和全貌，真不知道这是戈公振先生的过错还是后人的过错。

3. 旧——陈旧

有关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江苏省及东台市主编的各类文史资料和纪念文集上，代表性的如《纪念戈公振诞辰九十五周年专辑（东台文史资料第三辑）》《戈公振纪念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四集）》《戈公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戈公振年谱》，这些资料整理和收录了众多富有价值的史料和论文，具有地方史价值和新闻史价值。

其中，学界对戈公振新闻思想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大抵来源于三个渠道：一是以方汉奇、宁树藩、王凤超等老一辈新闻史学家为代表进行的考证和研究。比如杨瑾琨、方汉奇、宁树藩、王凤超四人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1985年10月）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一共考证出戈公振原著中200多处错误，对《中国报学史》的史料错误进行了全面纠正。^②再如方汉奇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对戈公振提出的报纸起源“汉朝说”进行了

① 吴晓晶：《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光明日报》，2006年2月25日。

② 实际上早在1928年5月28日，史学家张荫麟就以“素痴”的笔名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一文，指出书中的“资料之待补者”“疏谬之待正者”若干。

批判,并以进奏院状为凭证,提出中国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的观点。同时,对戈公振引用周密《癸辛杂识》中的“邸报既行”来作为元朝曾经发行邸报的证据提出质疑,认为元朝是唯一没有封建官报的朝代。二是陈力丹、黄旦、单波等新一代新闻学者的研究。陈力丹先生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和黄旦先生的《“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虽然将研究对象确立为“五四”前后的新闻学(思想),却不约而同地以确凿的史料论证了戈公振新闻思想在“五四”前后新闻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单波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中对戈公振的研究不仅相对系统,而且视角独特,透视深刻。三是《中国新闻学术史》《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戈公振的媒介经营管理观及其现实价值》《戈公振国民媒介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戈公振的新闻美学实践》等论述中的相关部分,是2006年之前对戈公振新闻思想为数不多的研究。

4. 偏——片面

有关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未能系统化,相关研究要么只是研究其新闻思想的某一方面的内容,要么只是从特定视角对戈公振新闻思想进行单向审视。

从研究角度来说,尽管视角相对单一,或者研究对象相对局部,这些“片面”的研究无意之中拓展了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的领域,加深了对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的厚度。相对而言,将此归纳为“片面”的症候实在是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从研究的时间来看,这些所谓“片面”的研究大多出现在21世纪初,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新闻学术史》《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等书籍,《戈公振的媒介经营管理观及其现实价值》《戈公振国民媒介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戈公振的新闻美学实践》等文章。其中,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将戈公振作为报刊活动家在中国近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来审视,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则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剖析戈公振的思想流变,这些研究的高度都是全新的。而靖鸣、刘锐的《戈公振的媒介经营管理观及其现实价值》,靖鸣、袁志红的《戈公振国民媒介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和陈新明先生的《戈公振的新闻美学实践》,更是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以敢为人先的无畏勇气开垦出一片新的天地,大大丰富了戈公振新闻思想的内涵,这也对本书章节结构的取舍与确立具有借鉴意义。

2007年之后,随着新史料的应用、研究方法的多元、研究视野的开阔,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相关研究出现了新动向,也成为学界的新兴热点,每年都会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代表性论述诞生。

蔡斐的《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剖析》考察了戈公振先生以言论自由为主要标志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其自由主义有功利主义的夙求越位、色彩浓厚的理想成分、民本主义成分显目等特征,其背后有着“立足新闻本位的忧思”和“双重文化背景的影响”两个维度的深层动因,并在当代仍然有可反思的现实价值。

蔡斐的《世界的眼光 中国的问题——重读戈公振先生〈新闻学〉》主要关注戈公振先生的《新闻学》一书。作者综合考察后认为,该书尽管在篇幅、体例、影响等方面不如《中国报学史》,但全书流露出对世界新闻业的熟稔程度,对国内新闻业的关切心情,对新闻理论的驾驭能力,以及对新闻实务的探索热情,是一本不应该被遗忘的著作。

王明亮、刘佩的《戈公振参与两次国际间新闻会议故事重探》对戈公振1927年和1933年分别参加了日内瓦报界专家会议及马德里国际新闻会议的史实进行了梳理。文章揭示了此前新闻史著述中多语焉不详的一些历史细节,认为戈公振的参会虽然有偶然因

素,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列强的实质性让步,但却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正式参与国际新闻界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其积极为中国争取新闻话语权的姿态具有开创性意义。

李开军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分期观点探源》一文通过详细考证认为,《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主张的中国报刊发展经历了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纸营业时期的观点,来自他在《时报》的同事汪英宾的硕士论文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而汪氏的这一分期观点,则来自他对包括 *The Journalism of China* 在内的至少五种英文文献对中国报刊发展历史的观察和理解的整合。

齐辉的《民国初年中国报人对世界报业的认知与思考——以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活动为中心探讨》细致探讨了1927—1928年戈公振自费出国考察的活动,指出戈公振通过此次考察活动,搜集了大量新闻史资料,实地感受到世界新闻发展的潮流,并对中外报业进行了深入思考,是近代国人考察世界报业的一次壮举。他准确把握了世界新闻发展的潮流,提出了“中国急需一个代表通讯社”“世界报纸的三大趋势”等判断,为中国的新闻学发展提供了异域借鉴。

高海波的《论戈公振的传播思想》一文,以《中国报学史》所使用的“交通”一词为中心,对戈公振的传播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该词一方面源于中国本土观念,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卡尔·毕歇尔、藤原勘治等人的新闻学说。在此基础上,戈公振提出报刊是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的观点,并据此分析了中国新闻史上官报、民报和外报之间的传播关系。戈公振的传播论述,是传播概念中国化的最早尝试之一。

宋三平、张振亭的《论戈公振与上海〈时报〉“专刊”》主要关注戈公振与《时报》“专刊”的紧密联系。戈公振不仅策划各种专刊的创办、发展,还亲任《图画周刊》的主编。他认为风靡一时的报纸专刊只是为形势所迫,虽然代替了杂志的部分功能,但是其自身有不可化解的内在矛盾;理想的报纸专刊应该以文艺为基础,贴近读者的常识与日常生活。这些专刊是我国最早创办系列专题周刊的报纸,在整个报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赵昊的《戈公振国外新闻图片研究》,以《良友》画报为中心,系统考察了第22期至第111期的相关图像,论述了《良友》对戈公振国外行踪的图片报道,通过国际联盟情况、苏俄情况、艺术情况三部分,阐述了戈先生从国外寄给《良友》的图片,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了戈公振的国外新闻图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刘敏的硕士论文《戈公振与报纸“图画周刊”研究》主要以《时报图画周刊》《申报图画周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内容、版面、运作模式的分析,来研究戈公振有关报纸“图画周刊”的认识、理念和思想,并追溯了戈公振重视“图画周刊”的渊源和思想来源。研究认为,戈公振重视“图画周刊”,是其新闻形象化、报刊大众化等新闻思想的直接表现,与其职业经历有关,也是其出国考察并学习借鉴国外有关报刊经验的结果。

吴翔是近年来着力研究戈公振问题的学者,先后发表了《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八个版本》《戈公振:近代新闻法制研究第一人》《戈公振在何时当总编辑——从戈公振〈时报〉新闻活动的考订看民国报人转型》《戈公振的家庭“悲剧”及婚恋生平补考——兼谈港台民国报人回忆录中的“戈公振绯闻”》等文章,对戈公振的生平、新闻法制思想、著述成果等展开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朱兆龙先生汇编的《戈公振时评》一书,对戈公振先生在上海《时报》任职期间写作和发表的时评共1,791篇进行整理汇编,认为这些时评作为戈公振投身于新闻事业的高起